

“败家爷们儿”托尔斯泰



本报记者 王昱

一周史记

下周史上那点事儿
(11月16日—11月22日)

前几天是“光棍节”，虽说名曰“光棍节”，这一天最累的却是有老婆的汉子，因为他们得严防死守，看紧自己的“败家娘们儿”，不让她们过度网购。所以说，在这一天里，光棍们反而挺让人羡慕。这么一说，“光棍节”也算实至名归。

说起来，怎么跟老婆相处对于男人来说从来就不是个简单问题。而在夫妻关系处得最糟糕的大人物中，俄国大文豪列夫·托尔斯泰肯定排得上号，有人说他就是被老婆逼死的。

1911年11月20日，几天前怀揣着69卢布，在82岁高龄时毅然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，因旅途中染

病，死于俄国阿斯塔波沃火车站。对于一个八旬老翁来说，在俄罗斯的冬季里离家出走，是典型的作死行为，托尔斯泰为何宁可寻死也不呆在家里，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桩有名的公案。

对于这问题，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这样的——晚年的托翁精神层次一跃千里，一再表示要放弃不劳而获的贵族生活，去当“普通农民”。1895年，他立了一个非正式的遗嘱，宣布放弃自己所有的财产。这份遗嘱遭到了妻子索菲亚的极力反对，她变得歇斯底里，托尔斯泰不堪忍受她的折磨，于是最终选择“为追寻灵魂家园”愤而出走。

很多“托粉”自然会被这个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，认为托翁高大上得不得了，而他老婆呢，显然是个吝啬、保守、令人生厌的“河东狮”。不过，当我们重新回望这个故事时却发现：托尔斯泰的出走，事的确是这么个事，但理却未

必是这么个理。

先说说索菲亚这个人，与我们的想象不同，她绝非是个粗鄙的“河东狮”，贵族出身的索菲亚其实非常有修养，年轻时也挺漂亮。为了将她追到手，托尔斯泰当年花了不少小心思。在成为托尔斯泰的妻子后，卸下“女神”光环的索菲亚迅速转变角色，成了一名聪慧、勤恳、爱丈夫的贤妻。除了操持家务、照顾孩子，她对丈夫的工作更是鼎力支持。据记载，托尔斯泰虽然才气纵横，但自己写稿从来都是字迹潦草。托尔斯泰所有文稿的誉写工作，都压在了索菲亚的肩上，索菲亚成了他的抄写员、编辑和档案整理者。据说《战争与和平》(其篇幅之长，读一遍就累死人)一本书，索菲亚就前后誉写过六遍，连托尔斯泰自己都：“(索菲亚)是我最好的助手，最理解我的人。”

既然托尔斯泰自己都说索菲亚“最理解”他，那将索菲亚描述

为一个拖丈夫后腿的女人就变得非常不可思议。其实，托尔斯泰与其妻子闹翻的真正原因，恰恰不是妻子不理解他，而正是因为她太了解他了——索菲亚觉察到了一点，她的丈夫晚年所经历的不是灵魂升华，而是“矫情”。托尔斯泰向往的那种生活，他自己其实一天也过不下去。比如托尔斯泰主张像农民那样耕作、生活，但他至死都没放弃许多贵族癖好(骑马、读书、抽高档烟等)；托尔斯泰提倡完全戒欲，甚至戒除夫妻生活，但索菲亚婚后却一再怀孕，她一共怀孕16次，生了13个孩子……

托尔斯泰身为大贵族，虽然厌恶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却无法抛弃它。对于今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有着审美价值的人生悲剧；但对于要跟他过日子的妻子来说，却是个很要命的问题。跟所有的妻子一样，面对这个不着调的“败家爷们儿”，索菲亚一再提醒丈夫别矫情了，好好过日子。而这一举动

恰恰是“文青”托尔斯泰最烦的，两人因此闹得不可开交，并最终双双走向了偏执。这才是托尔斯泰晚年“家务事”的真相。

公正地说，托尔斯泰晚年对于妻子的厌烦，已经让他丧失了原本坚持的道德准则。有一次，索菲亚得子宫瘤在家中做手术，托尔斯泰不仅不守护在妻子身边，还离家去了森林散步。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脱险的妻子时，还大发感慨：“上帝啊，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平静地接受死亡呢？”相信就连“托粉”读到这里恐怕都会毛骨悚然——这还是那个在小小说里对无数读者灵魂进行过洗礼的大文豪吗？

我们中国人有时迷信道德的力量，然而，很少有人提醒我们，“唯道德论”存在着极大风险。对于道德的过分执着，很可能会将人们引向道德的反面。列夫·托尔斯泰的出走与死亡，为我们昭示了这一点。

美国人为何“热爱”连环杀手

杀手何以变成杀手

美国犯罪学家司考特·伯恩博士在其新书《我们为什么热爱连环杀手》中尝试解开上述之谜。他说：“我的问题是：我们能从杀手身上得到怎样的启示？我们对自己又有多少认知？人们热衷于了解黑暗一面，而黑暗是人生的一部分。”

探寻连环杀手的内心世界对不少人而言具有强烈诱惑。在美国国家犯罪与惩戒博物馆，59岁的游客乔安娜·马弗尔描述了他们一家人对犯罪案件的浓厚兴趣：她的祖

父是犯罪类杂志的忠实读者；她的父亲声称曾在芝加哥见过黑帮教父阿尔·卡彭；她本人则热衷于探究杀手的童年对其一生的影响。

“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对杀手何以变成杀手更感兴趣，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。”马弗尔说。

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连环杀手警示信号：尿床、虐待动物和纵火。这源自1963年一个名叫约翰·M·麦克唐纳的精神病学家基于100名有暴力行为病人的研究，又

称“麦克唐纳三要素”。但后来的研究驳斥了这一说法，认为麦克唐纳的研究设计不够合理，且样本太少，上述童年表现不足以预示长大后会有暴力行为。

目前，尚无一个简单办法来确定一个人是如何成长为连环杀手的。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出，有很多因素影响到人的行为，就像你无法枚举一个人决定结婚的所有理由，也不可能穷尽一个人变成杀手的所有原因。

作案手段残忍离奇

拉德福德大学连环杀手数据库显示，美国自1900年以来共出现过2600多名连环杀手，居全球首位；英国次之，有142名。美国布法罗大学研究连环杀手和犯罪文化的教授戴维·施密德说，因为美国连环杀手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，所以每当提及连环杀手，人们往往不由自主认定他是美国人。

美国之所以多产连环杀手，与其高暴力犯罪率息息相关。其中一些杀手作案手段残忍离奇，很容易“吸睛”，从而一举成名。试

想，当媒体每天充斥着枪击事件报道，如果再发生一桩新案件，受害人依然为枪所伤，人们的反应势必趋于麻木；如果杀手是持刀捅人，对受害人实施折磨、甚至吃掉受害人，那一定会“脱颖而出”，成为公众话题。

美国国家犯罪和惩戒博物馆经理蕾切尔·彭曼说：“我对枪支暴力已经‘免疫’，但如果有人持刀行刺，我的身心都会感觉到惊吓。这是不同的感受。两者虽是同种性质的犯罪，但实际感觉不一样。”

施密德教授说：“我们已经基

本丧失被惊吓的能力，现在需要非常非常极端的犯罪才能让我们恢复那个能力。”

出名的连环杀手恰恰因极端而出名。有的因为作案手段凶残，比如，著名的杀人狂魔丹尼斯·雷德自称“BTK”杀手，意即“绑、虐、杀”；有的因其疯狂程度，比如“十二宫杀手”每次作案后，都会向媒体寄一封信，留下密码和线索，向警方挑衅。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深深吸引着公众，而对答案的渴望又能让热度持续。

报道更加“小说体”

除对公众生理和心理产生强烈刺激外，连环杀手的故事还能极大调动人们的想象力，因为他们拥有畅销小说的基本元素：危险、神秘、英雄、恶棍、因果报应。

“有时你很难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迅速画出一条实实在在的界线。”施密德说，“犯罪真人秀常常使用小说技巧来凸显戏剧效果，而小说常常基于真实事件以增强现实感。”

这就是为什么对阅读连环杀手报道或观看电影《沉默的羔羊》，公众可能感觉并无多大区

别。“他们同样耸人听闻，同样娱乐百姓。”伯恩在其书中写道。

事实上，小说和现实确实彼此交融：《沉默的羔羊》中收集人皮的角色布法罗·比尔，其原型部分基于真实杀手埃德·盖因，他喜欢收集女人的肢体；杰弗里·达默无数次被拿来和食人的汉尼拔·莱克特做比较，尤其是在《沉默的羔羊》公映之后。

甚至连新闻报道也出现以故事手法描述连环杀手的倾向。伯恩阅读了1995年至2013年间《纽约时报》和《时代》周刊所有

提及连环杀手的报道，发现35%的文章用到“恶魔”、“怪物”、“邪恶”等词汇。

当连环杀手逍遥法外时，为回应公众对真相的渴望，媒体和执法部门往往依据固有的道德指引说：“恶魔已经来到我们的城市，但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战胜恶魔。”这种善恶对决、猫捉老鼠的故事架构大大简化了真实的案情，淡化了杀手背后的复杂动因。结果是，所有细节具化成一个拥有超人能力的连环杀手，并最终成为畅销小说的主人公。

“一切都只是娱乐”

研究表明，人们热衷于惊悚故事可能出于各种原因。

1995年一项针对青少年观看恐怖电影的调查显示，那些所谓的“嗜血观影者”，即承认喜欢血腥画面的人，表现出不够有同情心、追求冒险刺激的强烈需求；那些所谓的“惊悚观影者”，即为感受惊吓而看电影的人，则表现出既渴望冒

险刺激，又有高度的同情心。前者对杀手而非受害者存有一定认同感，后者则既不认同杀手，也不认同受害者，他们只是因为刺激和神秘感而被电影剧情所吸引。

伯恩说，唯有当真实的连环杀手来敲门时，你才会有真实的恐惧感，在此之前，“一切都只是娱乐”。施密德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

人们为何对连环杀手津津乐道：他们对罪犯怀有一种复杂心理，既恐惧又羡慕，因为罪犯仿佛生活在另一个“自由”世界里，不受法律和社会规范的约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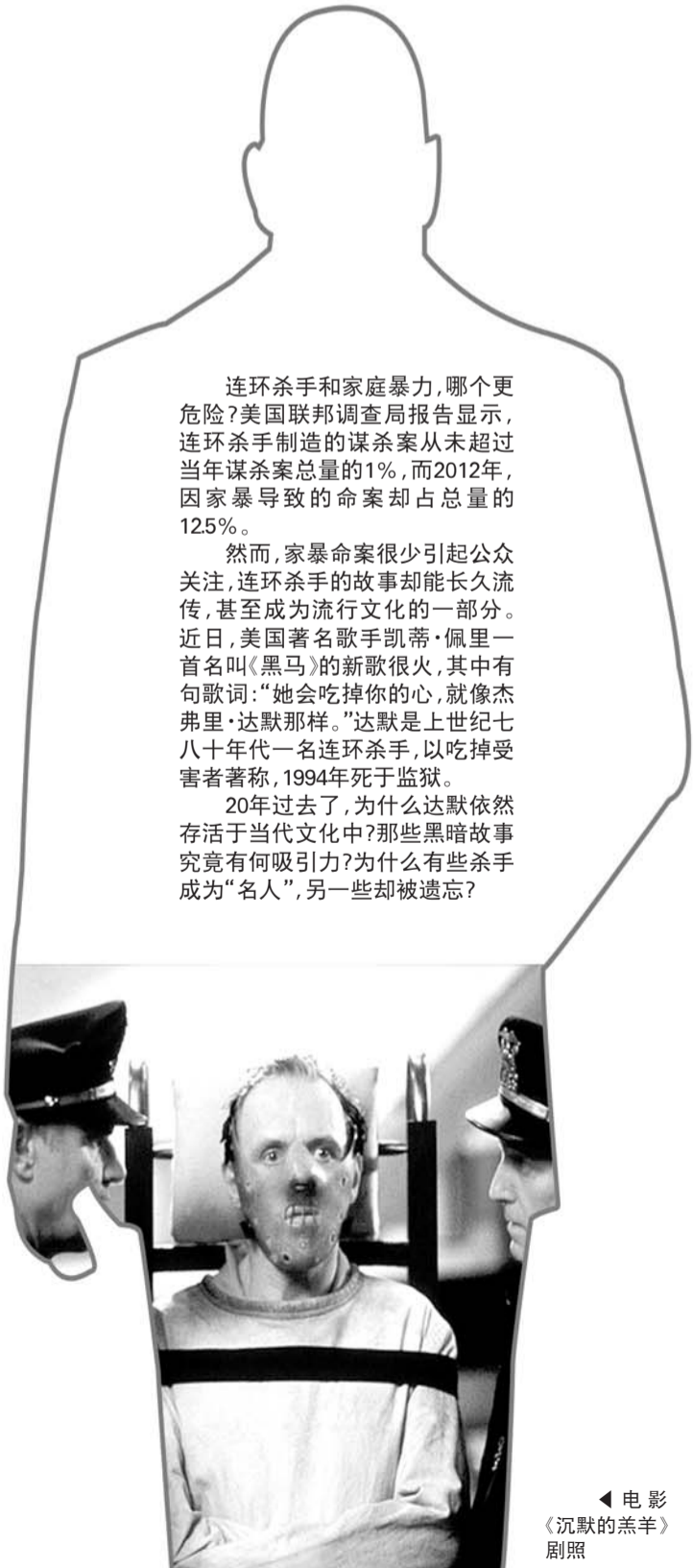
“并非我们希望到处杀人，只是好奇：如果我们随心所欲，生活将会怎样？”施密德说。

据新华社

连环杀手和家庭暴力，哪个更危险？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显示，连环杀手制造的谋杀案从未超过当年谋杀案总量的1%，而2012年，因家暴导致的命案却占总量的12.5%。

然而，家暴命案很少引起公众关注，连环杀手的故事却能长久流传，甚至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。近日，美国著名歌手凯蒂·佩里一首名叫《黑马》的新歌很火，其中有句歌词：“她会吃掉你的心，就像杰弗里·达默那样。”达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名连环杀手，以吃掉受害者著称，1994年死于监狱。

20年过去了，为什么达默依然存活于当代文化中？那些黑暗故事究竟有何吸引力？为什么有些杀手成为“名人”，另一些却被遗忘？



电影《沉默的羔羊》剧照